

# 空间象征性意义的研究进展与启示

朱 竑, 钱俊希, 封 丹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广州 510275)

**摘 要:**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朝向新人文地理学转型, 地理学者对于空间的探求逐步从对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物理性的空间分析, 转向对于空间自身进行深入的文化分析。空间的概念逐步被文本化, 进而成为地理学学者分析的本底材料。空间被定义为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过程的反映。对于空间的分析即可以揭示出深刻的社会过程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演变。本文通过对空间意义与象征性概念的解释, 介绍空间意义与象征性, 并通过对西方学者实际案例的介绍, 进一步理清空间意义与象征性的研究内容以及对于国内研究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关 键 词:**空间; 意义; 象征性; 新文化地理学

## 1 引言

自20世纪以来,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带动下, 欧美文化地理学者对于空间的研究逐步由宏观走向微观; 从对文化现象在空间组织层面上进行分析, 如研究文化现象的分布特点, 划分文化区, 解释文化现象的空间传播等, 转向对于具体的空间实体进行文化分析与文化解读, 即从传统的文化的空间分析转向新文化地理学背景下空间的文化分析<sup>[1-2]</sup>。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是一种过程(process), 是社会(或社会空间)过程的一部分, 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它在社会中如何运作。因此, 试图将文化看作是一个“过程”而非所谓“超级机制”<sup>[3-5]</sup>。在这一“转向”下, 当前新文化地理学对景观的分析充满了权力、话语的政治分析。其中重要的视角如: 分析某个景观的变化过程: 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 哪些力量、机构造成了这种变化? 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怎样的权力关系, 影响的结果是什么? 此类文化地理的研究, 将“文化”概念扩大化。文化不再仅仅是描述服饰、语言、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事项的分布和传播, 景观的意义和过程更成为主流的研究视角。在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 空间也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几何形态, 而成为一种可供分析与解读的文本。由于社会文化与政治过程对于空间景观存在塑造与重构的作用, 空间遂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载体, 以及一种意义系统、象征系统

与所指系统<sup>[6]</sup>。

在空间文本化的理念指导下, 西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开始越来越注重对于空间与景观的符号学意义的解读, 通过空间的隐喻意义, 从空间中寻找文化的力量。地理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不再只是将文化作为空间行为的对象, 而是深入文化本身, 探讨文化对于空间的建构与塑造作用<sup>[7]</sup>。空间的形象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得到重构, 越来越多的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关注空间所承载的社会过程与文化过程, 大有“无文化, 不空间”的势头。于此同时, 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 例如人类学、社会学等, 对于空间研究的兴趣也不断高涨<sup>[8-9]</sup>。这些学科由于没有受到传统空间研究的束缚, 因此, 对于空间的关注直接切入到对于空间文化与社会意义的解读上, 从而进一步带动了地理学者朝着空间文化研究的不断转向。即从文化的角度来对于空间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与象征性进行剖析与解读。

## 2 空间象征性的解释

西方人文地理学对于空间的认知有着漫长的演进与发展的过程, 其中 Harvey(哈维)对于空间类型的经典划分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根据哈维的观点, 传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空間可划分为3类: 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概念来源于康德“物在自身”的哲学理念, 此类空间的存在在于空间实体本身,

收稿日期: 2010-01; 修订日期: 2010-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1067); 广东省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05ZD790008);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7-0889)。

**作者简介:**朱竑(1968-), 男, 甘肃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 文化地理学及旅游地理学。E-mail: zhuh@senu.edu.cn

独立于外界的物质世界);相对空间(Relative Space)(对于此类空间的理解,需要从事物的存在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出发);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这类空间的概念与相对空间存在一定重叠,但强调空间联系本身,认为空间的存在只是由于其包含与体现的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sup>[10]</sup>。哈维的空间划分对于理解空间概念虽然大有裨益,但在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中则不免显得过于机械。Aase 于是指出,各类空间的产生乃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情景。理解空间,更多的是应该理解这些空间幕后的情景,而不是去寻求一个“真正”的、一劳永逸的空间定义。他引用了人类学家 Daniel 在南印度 Tamils 部落的野外考察成果,认为 Tamils 人居住的村庄“ur”的空间组织体现了本部族人的宇宙观。按照他的说法,Tamils 人“将空间概念化为一种范式——一种超越抽象概念而具有意义的空间”。他于是提出,空间是人工造就的,地理学的任务应当是建立在探求空间社会性生产的过程;他同时指出,现代性的变量因素是多元化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之外,文化的逻辑是丰富多彩的。而地理学应当关注社会过程,并且探求空间在这些过程中的相关性。Aase 最终的结论是,地理学研究应当从有限的空间类型中解放出来、要敢于将象征符号作为一种研究的数据,来解释宇宙观,以及其他社会方式对于空间的构建作用<sup>[8]</sup>。

研究空间的象征性,首先需要理解象征性的含义。事实上,对于象征与象征性的精确理解,西方哲学界一直都没有达成确切的定义。而地理学研究所采用的象征性理念,则较倾向于符号学家 Peirce 的定义,即象征是一种若没有解读者(Interpretant)便不存在意义的符号,即只有在被人理解时其所蕴涵的含义才是存在的。例如对于英文单词“Mountain”来说,其单词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的意义,只有当人们的认知世界将其与“山”这一物质实体联系起来时,其象征性才是可以被理解的<sup>[11]</sup>。当然,地理学中对于象征性的理解与语言学相比又更复杂一步。Backhaus 阐释了象征性这一概念在地理学研究,尤其是空间与景观研究中的应用。他认为象征性是与运用象征的人类思维紧密联系的,象征性意味着人们将某种含义转译到某类媒介之中,而象征的过程就在于将意义从即时的社会情景中解放出来,通过空间的承载,成为一种“文化实体”。具体到地理学的空间研究中,象征性即是在空间上对于社会与文

化意义的构建,象征的体验者,象征意义本身以及被象征化的实体在地理上形成了一种“意义场”,而空间与景观的象征构建即是鲜活的人类生活与环境不断作用的结果<sup>[12]</sup>。

当然,在对于空间与景观象征性的理解上,部分西方学者持有一种泛化的态度,即认为任何空间都具有其意义,即使是被划定为“非象征性”的空间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含义的载体。对于“象征性”与“非象征性”的空间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分野,西方文化学与地理学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sup>[12]</sup>。空间象征性研究的权威 Cosgrove 等人虽然批判将两类概念明确划分的做法,但在其本身对于空间象征性的解释中却又难以避免地表现出 2 类空间二元分异的色彩<sup>[13]</sup>。事实上,对于此类问题的讨论,极易使人陷入到形而上学式的无休止争论中,对于地理学者来说,即使承认全部或大多数的空间实体都可以被定义为意义的承载体,也应当看到,很大一部分空间所承载的含义早已高度被内化。因此,很难反映出显著的社会文化过程或社会变迁。因此,它并不具备明显的研究价值。由于象征性的确切含义难以界定,因此文化地理学者往往通过具体的案例来阐释对于空间意义的理解,而只有能够反映出激烈的社会过程,社会转型或社会权利斗争的鲜明案例,才是在地理学意义上具有典型性的研究对象。

目前西方学术界对于空间象征意义的研究已经涵盖了从宏观到微观各尺度的空间体系。在宏观尺度的空间象征性上,Richardson 等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欧洲空间发展规划中对于空间组织理念相互关系的研究较为典型<sup>[14]</sup>;在空间的类型上,不仅研究空间个体,也注意某些特定类型的空间,如宗教文化空间<sup>[15-16]</sup>。不过,由于空间研究本身的复杂性,绝大多数的西方文化地理学者对空间象征性的研究都着眼于特定的微观空间个体。通过对某个典型空间案例的分析,来解释特定区域的社会、文化演变,以及社会的权利冲突。此类空间通常是较为独特或较为重要的文化景观,且在景观的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中体现了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过程。

### 3 空间象征性意义解读的案例

西方文化地理学者在象征性空间案例的选择上十分多样,象征性的主题也涵盖文化、历史、宗教、社会多个层面。但总的说来,研究的话题可以概

括为2个主要方向,即反映社会变迁的过程,与反映社会的政治权利关系与权利斗争。除以上2大方向以外,其他话题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较为零散,无论是从研究的深度及广度上都不及前述的2大主要话题。

### 3.1 反映社会变迁的象征性空间

研究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对空间的塑造,以及空间景观自身的象征意义,是新文化地理学空间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而社会变迁的过程往往能够体现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激烈的冲突与演进过程。因此,为空间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与分析材料。自19世纪以来,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几乎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转型与社会政治文化的重构,从工业化、现代化、殖民主义,到冷战、苏联解体,几乎所有世界史上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都在空间与景观的组织与构建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在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方面,Waley对于日本近代城市大型公园的象征意义的研究较为典型。他将近代西方城市的公园描述为传统的城市生活的延续,以及资产阶级表达自身生活方式与社会价值的媒介。他通过分析日本东京在近代大规模建设城市公园的过程,认为公园作为一种公共的城市空间,实际上是日本近代开放后“新的社会价值在空间上的重新确认”,是日本将建设一个现代的、西方化的、工业化的首都的愿景融入到空间组织方式上的体现<sup>[17]</sup>。Park等则描述了传统的乡村景观地域Elora如何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不同的文化含义:从传统意义上肮脏、危险、疾病横行的乡村形象转变为人们寻求宁静、传统的乡村生活与乡村回忆的心灵圣地<sup>[18]</sup>;而在澳大利亚的纽加索,经过更新计划的传统工业区,则成为了一座面临发展瓶颈的城市在一个悲观的未来寻找乐观图景的心灵寄托<sup>[19]</sup>。

在殖民主义方面,Curtis通过对于巴西的城市广场规划设计演变分析,认为巴西的广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与社会空间,在设计上体现了一种明显的欧洲文化统治地位以及巴西的殖民地经历。殖民时代早期的公共广场通常以巨大的十字架体现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力;而文艺复兴后欧洲社会对于理性主义的推崇则体现于规则的格网式的广场规划上;而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文化的影响则又将广场规划推向法国式的建筑特征。这一过程的结果,不仅体现于广场形态中明显的殖民主义

色彩中,更在于由此造成的本土文化的缺失上<sup>[20]</sup>。

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变迁方面,Till讨论了柏林重要的纪念性建筑Neue Wache(New Guard-house)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反映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sup>[21]</sup>;而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城市景观的变迁,则是一段从苏联时代到国家独立,从苏维埃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到国家认同感回归的曲折历程的缩影<sup>[22]</sup>。Sidorov则通过对莫斯科重要的宗教文化空间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进行尺度分析,揭示了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地图上定位的变迁:从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世界主义视角,到尼古拉一世的欧洲视角,再到苏联时代重新采取世界视角,最后重回冷战后衰落的俄罗斯对于世界视角的最终放弃。空间成为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政治求索的缩影<sup>[23]</sup>。

### 3.2 反映政治过程与权利斗争的象征性空间

自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涌现以来,城市空间、社会景观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关系与权利斗争就成为了西方文化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Zukin认为城市的塑造过程不仅仅取决于人们如何综合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传统的经济因素,更取决于人们如何处理排除与赋予使用权的象征语言<sup>[24-25]</sup>。通过对于空间与景观的深层剖析,其隐含的社会政治过程被不断地揭示出来。事实上,空间组织中所体现出来的权利关系早在雅典卫城的建设中已经有所体现<sup>[26]</sup>。而西方对于当代的空间组织的政治过程的研究则带有明显的“抵抗地理学”的特征,即通过分析弱勢的权利主体对于主流权利集团的抗争,来解释政治过程对于空间的构建作用。

Leib对于美国佛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纪念大街(Monument Avenue)演变过程的研究是一个独特而发人思考的案例。里士满在美国南北战争一直是南方邦联的中心,南北战争后虽然南方战败,但里士满的纪念大街一直是纪念战败的南方奴隶主的重要空间:大量南方军的雕像充斥大街,形成了典型的“种族主义景观”。然而近些年,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激进主义者Arthur Ashe的雕像也被树立在纪念大街上,将纪念大街从一个种族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景观空间转化为了黑人挑战白人主流价值观的象征空间<sup>[27]</sup>。有关民族关系的象征性空间同样出现在渥太华英语与法语区的交界处,政府为了促进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的融合,特意在英法语交界区树立了宣扬民族和解的社会活动者Cartier的塑像,然后这一原本用来宣扬政府意识的空间反而成



为了法裔加拿大人抗议示威、争取独立的主战场,由此不同意识形态与权利团体之间的博弈不断重塑着空间的文化含义<sup>[28]</sup>。

政府与平民阶级之间的权利关系同样是空间象征性研究的重要话题。这里所谓的权利关系,不仅包括权利阶层对于底层的统治甚至压迫,也存在着不同的权利层次之间的对抗与斗争。例如 Kenny 通过分析英国殖民统治阶级在印度 Ootacamund 山建造的英式风格的避暑度假胜地,阐述了这一社会空间如何反映出印度的英国人的思乡之情与特权阶级的统治权利相互交织的独特社会秩序<sup>[29]</sup>。Philp 等分析了缅甸的佛教、佛教景观与军政府统治之间的关系。由于缅甸是一个传统的佛教国家,因此,佛教理念在缅甸的国家认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是军政府通过对于佛教建筑物的保存修缮以及在佛塔的布施活动来宣扬其统治的合法性,然而这类空间也同时成为了抵抗军政府独裁统治的民主人士进行反抗活动的场所<sup>[30]</sup>。类似的研究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例如,河内列宁塑像前的滑板者、胡志明陵墓前的晨练者<sup>[31]</sup>,首尔与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游行示威而被赋予抵抗意义的城市空间<sup>[32]</sup>,这些行为,就以空间作为载体,不断改写着社会与城市的权利地图。

除上述 2 大主题之外,西方对于空间象征性的研究还有相当多的零散话题。例如尼亚加拉瀑布代表了美国民族特征的景观形象<sup>[33]</sup>;圣胡安山脉(San Juan Mountains)成为当地居民心中理想的自然风光、居住地的标准、游憩机会和精神延续的象征<sup>[34]</sup>;Burnie Street 成为代表当地饮食文化和物质结构变迁的空间隐喻等<sup>[35]</sup>。博物馆也被作为社会普世价值观的承载场所<sup>[36]</sup>。纪念性的空间与景观对于构建国家认同与社会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重要作用<sup>[37]</sup>,宫廷建筑所反映出的国家在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历史轨迹<sup>[38]</sup>,快速的城市转型背景下城市空间意义的转变<sup>[39]</sup>等。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对于研究主题的划分并非是绝对化的,不同主题的研究之间也往往存在重叠。例如,除了从权利运动角度理解上文所述河内公共空间的演变外,越南国内不断开放的社会政治环境所产生的社会变迁也可以是理解河内城市空间的一个重要维度。对于同样的空间个体,不同的思维角度所产生的文化含义是不相同的<sup>[40]</sup>,这也体现了象征性的本质特点,即解读者自身的理解是文化意义与象征性产生的基础。

## 4 对于国内研究的启示

目前,国内文化地理的研究仍以将文化看作“事物”的观点为主。研究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的空间分布及演化过程,以分析史料为主要研究方法。然而,此种理论视角指导下的文化地理研究,研究话题较为狭窄,容易催生重复性的例证。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则为文化地理的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事实上,空间的文化意义与象征性在中国并不缺乏素材,例如大尺度的公共空间自古以来就反映出中国文化中的政治与权利理念<sup>[41]</sup>。虽然,国内在政治环境方面不存在西方社会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但社会转型却是当代中国社会谈论的热点话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空间组织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变革,社会的各个群体都积极地参与到各类社会空间的构建中,各类人群在空间上的组织不断发生着重构<sup>[42-43]</sup>。新的人口群体,例如城市贫困人群<sup>[44-45]</sup>开始出现,城市规划中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多样,这些现象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空间的组织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并为人们对于空间的理解提供丰富而有价值的素材。

目前国内的地理学者中虽然还没有直接以空间意义与象征性作为研究视角的研究成果,但一些建筑学学者从自身专业对于景观与空间的理解出发,对空间的意义做了一定的阐释。如通过对台北剥皮寮老街更新与改造的分析,认为城市老街区由于承载了城市居民对于过去的集体记忆,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sup>[46]</sup>,以及认为乡村公共空间的设计中应当融入乡村生活的特殊含义<sup>[47]</sup>。但这些研究往往还局限在就空间论空间的层面。无论是从对理论的解释,还是对现象的剖析上都缺少人文地理学者的深度。目前,西方学者对于空间意义与象征性的理解与研究不断深化,从乡村的绅士化空间所体现出的象征含义<sup>[48]</sup>,到新兴的城市文化主义<sup>[49]</sup>,文化不再是经济与政治的简单附属品,而是平行于其他要素成为空间研究的一个独立视角。人的不同行为都被赋予文化的含义,并通过与环境的互动不断地对空间进行诠释与重构。对于空间意义与象征性的理解,对于人们深入理解文化的内涵,抑或是诠释赋予空间含义的社会与文化过程,都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文化地理影响下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当有更加广阔的研究视角。

## 参考文献

- [1] 唐晓峰, 周尚意, 李蕾蕾. “超级机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 地理研究, 2008, 27(2): 431-438.
- [2] 李蕾蕾. 从新文化地理学重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框架. 地理研究, 2004, 23(1): 125-134.
- [3] Cosgrove D.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1-34.
- [4] Duncan J. The superorganic in American cultural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 1980, 70(2): 181-198.
- [5] Mitchel D.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0: 3-100.
- [6] 李蕾蕾. 当代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知识谱系引论. 人文地理, 2005, 20(2): 77-83.
- [7] 周尚意. 英美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地理学. 地理学报, 2004, 59(SI): 162-166.
- [8] Aase T H. Symbolic spac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in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1994, 76(1): 51-58.
- [9] Halford S. Sociology of space, work and organization: From fragments to spatial theory. Sociology Compass, 2008 (2-3): 925-943.
- [10]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3:13-14.
- [11] Peirce C S. Logic As Semiotic: A theory Of Sign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5: 19-20.
- [12] Backhaus G. Introduction I: The problematic of grou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ymbolic landscape//Backhaus G, Murrungi J. Symbolic Landscape.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9: 3-21.
- [13] Daniels S, Cosgrove D. Introduction: iconography and landscape//Cosgrove D, Daniels 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2-42.
- [14] Richardson T, Jensen O B. Linking discourse and space: towards a cultural sociology of space in analyzing spatial policy discourses. Urban Studies, 2003, 40(1): 7-22.
- [15] Kong L. Ideological hegemony and the political symbolism of religious buildings in Singapo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3, 11(1): 23-45.
- [16] Kong L. Negotiating conceptions of “sacred space”: A case study of religious buildings in Singapore. Trans. Inst. Br. Geogr. N. S, 1993, 18(3): 342-358.
- [17] Waley P. Parks and landmarks: Planning the Eastern Capital along western line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05, 31(1): 1-16.
- [18] Park D C, Coppack P M. The role of rural sentiment and vernacular landscapes in contriving sense of place in the city’s countryside.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1994, 76(3): 161-172.
- [19] Miles S. “Our Tyne”: Iconic regeneration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identity in Newcastle Gateshead. Urban Studies, 2005, 42(5-6): 913-926.
- [20] Curtis J R. Pracas, place and public life in Brazil. Geographical Review, 2000, 90(4): 475-492.
- [21] Till K E. Staging the past: Landscape designs, cultural identity and Erinnerungspolitik at Berlin’s Neue Wache. Cultural Geographies, 1999, 6(3): 251-283.
- [22] Bell J. Redefin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Uzbekistan: Symbolic tensions in Tashkent’s official public landscape. Cultural Geographies, 1999, 6(2): 183-213.
- [23] Sidorov D. National monument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r in Moscow.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0, 90(3): 548-572.
- [24] Zukin S.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73.
- [25] Zukin S. From Coney Island to Las Vegas in the Urban Imaginary: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Growth and Decline. Urban Affairs Review, 1998, 33(5): 627-654.
- [26] Loukaki A. Whose genius loci? Contrast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cred Rock of the Athenian Acropoli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7, 87(2): 306-329.
- [27] Leib J I. Separate times, shared spaces: Arthur Ashe, Monument Avenue and the politics of Richmond, Virginia’s symbolic landscape.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2, 9(3): 286-312.
- [28] Mitchell K. Monuments, memorial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Urban Geography, 2003, 24(5): 442-459.
- [29] Kenny J T. Climate, race and imperial authority: The symbolic landscape of the British hill stations in Indi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5, 85(4): 694-714.
- [30] Philp J, Mercer D. Politicised pagodas and veiled resistance: contested urban space in Burma. Urban Studies, 2002, 39(9): 1587-1610.
- [31] Thomas M. Out of control: emergent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urban Vietnam. Urban Studies, 2002, 39(9): 1611-1624.
- [32] Salmenkari T. Geography of protest: places of demonstration in Buenos Aires and Seoul. Urban Geography, 2009, 30(3): 239-260.
- [33] McGreevey P. The end of America: The beginning of Canada. Canadian Geographer, 1988, 32:307-318.
- [34] Blake K. Peaks of identity in Colorado’s San Juan Mountains.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1999, 18(20): 29-55.
- [35] Duruz J. Rewriting the village: geographies of food and belongs in Clovelly, Australia.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2, 9(4): 73-388.
- [36] Shoval N, Strom E. Inscribing universal values into the urban landscape: New York, Jerusalem and Winnipeg as case studies. Urban Geography, 2009, 30(2): 143-161.
- [37] Azaryahu M, Kellerman A. Symbolic places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revival: A study in Zionist mythical study. Trans. Inst. Br. Geogr. N.S, 1999, 24(1): 109–123.

[38] Nast H J. Islam, gender, and slavery in West Africa circa 1500: A spatial archaeology of the Kano Palace, Northern Nigeri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6, 86(1): 44–77.

[39] Mock J. We have always lived under the castle: historical symbol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eaning//Rotenberg R, McDonogh G. *The Cultural Meanings of Urban Landscape*. Westport: Bergin & Garvey, 1993: 63–73.

[40] Rutheiser C. Mapping contested terrains: schoolrooms and streetcorners in urban Belize//Rotenberg R, McDonogh G. *The Cultural Meanings of Urban Landscape*. Westport: Bergin & Garvey, 1993: 103–120.

[41] 庞宏, 刘峰. 创造新型的城市文化空间. *武汉工业大学学报*, 1998, 20(4): 121–123.

[42] 冯健, 周一星. 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 *地理学报*, 2008, 63(8): 829–844.

[43] 李志刚, 吴缚龙. 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 2006, 61(2): 199–211.

[44] 袁媛, 薛德升, 许学强. 转型期广州大都市区户籍人口贫困特征和空间分布. *热带地理*, 2006, 26(3): 248–254.

[45] Liu Y T, Wu F L, He S J. The making of the new urban poor in transitional China: Market versus institutional based exclusion. *Urban Geography*, 2008, 29(8): 811–834.

[46] 徐裕健. 历史街区空间文化意义的重构: 台北 “剥皮寮老街” 的人文生命力的发掘与实践. *城市建筑*, 2006(2): 25–29.

[47] 陈金泉, 谢衍忆, 蒋小刚. 乡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意义及规划设计.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2007, 28(2): 74–77.

[48] Phillips M. The production, symbol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gentrification: impressions from two Berkshire Villages. Trans. Inst. Br. Geogr. N. S, 2002, 27(3): 282–308.

[49] Borer M 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the urban culturalist perspective. *City & Community*, 2006, 5(2): 173–197.

## On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Space

ZHU Hong, QIAN Junxi, FENG Dan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trend of 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academia galvanized a transformation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especially cultural geography, from a macroscopic view of space to a more microscopic one.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s in “new cultural geography”, space should be textualized and thus made accessible for interpretation. Space is no longer defined merely as a material entity where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henomena are located and distributed, but media through which social processes take place and exert influences. Since social processes and power relationships constantly reshape the meanings and define the constructions of spaces, the interpretations of spaces can therefore reveal those processes and transformation embedded in the meanings conveyed by particular spaces. To understand spatial symbolism requires at first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ions of symbolis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uman geography. With elaborations by Aase, Peirce etc., we get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symbolism in geography,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meanings engendered from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behaviors and the environmental milieu. In the mean time, geographers should then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intens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power relations, in order to reveal both cultural and spatial impacts of the above processes in society.

Research cases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main themes: (1) social transformation; (2) political and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or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n this paper, cases drawn from western literature are briefly introduced to present a collective view of mainstream research interest concerning the meanings and symbolism of space. The authors then propose that in order to keep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trends, the topic of space symbolism is worth attention for the Chinese geography researchers. In light of the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processes in Chinese society will then produce profound influences on spatiality, thus inserting meanings into spaces.

**Key words:** space; meanings; symbolism; new cultural geography

本文引用格式:  
朱弘, 钱俊希, 封丹. 空间象征性意义的研究进展与启示.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6): 643–648.